

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 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

李国珍¹, 张应良², 易裕元³

(1,2.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3. 中国农科院 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 基于重庆的调查,采用 PLS 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1)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和非农从业能力的提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对改善农户生活条件与增进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保障农户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剥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户流转意愿;(2)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偿抑制了生态福利补偿;(3)兼业化程度越高,经济和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

关键词: 工商资本;福利补偿;农户;流转意愿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22)03-0088-12

一、引言

工商资本下乡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为了推动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2013 年中央 1 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工商资本跨界进入农业”。不仅如此,2020 年农业农村部《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指引》指出“引导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农村”。然而,工商资本下乡能否助推农业现代化,更深层次地取决于工商资本如何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2019 年流入企业的耕地有 0.58 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总量的 10.4%,土地流转规模增长速度为 3.7%,远低于同期的农业专业合作社的 4.0%,及其他经营主体的 10.2%;2015—2019 年,流入企业的比重一直停留在 9%~10% 左右^①。这一数据表明,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似乎陷入了“低水平困局”。那么,工商资本下乡^②进程中,农户的土地流转决策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 换

① 中国农村政策与改革统计数据显示:2015、2016、2017 年流转入企业的比重分别为 9.4%、9.7%、9.8%,2018 年为 10.3%,2019 年为 10.4%。

② 需要指出的是,工商资本是一种资本形式,并不能直接作为行为主体,需借助一定的组织载体来实现其对农村场域资源的有效配置。本研究的资本下乡主要指工商资本以企业、组织或个人等形式所进行的土地流转行为。相应地,工商资本作为经济行为主体时,主要指工商企业。

作者简介: 李国珍,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讲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提升中国粮食产业战略竞争力的重点方略与路径选择研究”(20AGL023)项目负责人:张应良;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资本下乡与农户家庭资源配置效率研究”(2017YBJJ045),项目负责人:李国珍;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项目“工商资本下乡背景下非农业主与农户之间的权益冲突及其治理研究”(SWU1709262),项目负责人:李国珍。

言之,工商资本下乡是如何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工商资本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这些问题的回答涉及国家对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可持续性,进而对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纵深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试图从微观视角,采用 PLS 路径模型对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意愿进行评估,期望能为当前工商资本下乡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依据。

二、文献综述

当前,围绕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展开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外界条件等四大因素^[1]。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的福利后果与农户意愿研究逐渐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学者们从禀赋效应、损失厌恶、生活质量等角度考察福利因素与农民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2-3],并认为福利效果会直接影响农户对后续产业的参与度。除经济福利价值外,由于土地还具有社会稳定、生态服务等非经济福利价值,多数学者认为,“一次性经济补偿”或“土地换取社保”的简单做法,并不能满足农民的现实需要,应将农地的多福利价值一并纳入补偿之中^[4]。除交易成本、经济利益外,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成员态度是决定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主要依据^[5]。渴望获得全部的土地赔偿与农户的心理落差是影响农户流转意愿的重要机制之一^[6],政府应在制度安排上给予相应的福利保障。不仅如此,对于土地的多功能价值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作用的认识也得到了学界的关注,认为土地的非经济价值与社会财富分配、耕地保护等问题相互交织,衍生出愈发尖锐的土地权益矛盾^[7],土地规模化流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导致了农户面临耕地用途的不确定性等风险,降低了农户经营土地的预期^[8]。纵观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学者们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福利因素进行了诸多讨论,也普遍接受土地多功能性的现实,并认为应该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户进行补偿。已有研究为理解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依据,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

第一,有关土地流转的福利效果与农户意愿之间的作用机制来看,多数文献以农地城市流转作为主要分析框架,然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流转带来农民身份的转化,与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给农户带来的影响并不相同,其作用路径及补偿机制也存在着较大差别,以此背景下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决策及其补偿依据显然有失偏颇;第二,与土地紧密相连的农户福利呈多元化分布,目前大部分研究或没有区分和比较福利补偿的多样性,或只是讨论了其中一种状态,并不能较为全面地阐述农户流转意愿和工商资本的福利补偿之间的作用关系;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多数文献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采用的是传统的二元 logistics、probit 回归方法。然而,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显然,传统的二元回归方法并不能全面反映工商资本下乡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最后,研究区域与研究数据方面。重庆属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集合与叠加了我国的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相似的基本特点。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表明国家希望重庆能在探索城乡统筹发展道路方面能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故论文以重庆为例展开分析,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鉴于此,本文以重庆市为样本区域,立足于工商资本下乡的现实背景,基于福利补偿视角,采用 PLS 路径模型实证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关系。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1)为清晰阐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以福利补偿为基点,将福利补偿具体解构为经济、社会、生态 3 个维度,提出工商资本下乡的福

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理论假说;(2)研究方法的改进。考虑到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本文采用 PLS 模型分析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作用路径,该方法能够验证在多种自变量情况下,且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影响作用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使得到的研究结论更加清晰;(3)研究区域与研究数据的选择。论文以重庆为例展开分析,其研究结论可能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我国,长期以来,农户依附土地生存、就业,乃至养老。土地存在着生产、生活、生态等多重功效^[9]。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又衍化出财产、融资、保障、休闲等功能^[10]。尽管,土地存在着多样化功能,但是经济、社会、生态仍然是三个最为重要的功能。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既是生产要素,还是实现福利保障的基础^[11]。土地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农户福利状况的好坏,并且与农户福利大小呈正比关系^[12]。实际上,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正是体现在工商资本下乡对土地上所附着的各项功能进行合理的替代,即福利补偿。本文基于土地的多功能价值,将福利补偿相应地区分为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以及生态福利补偿等三个方面。

(一)经济福利补偿

即对土地在实现农户家庭经济功能方面所体现的价值补偿。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要素,土地耕作是农户获取经济收入、维持家庭生计的主要手段。

(1)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拓宽了农户家庭的收入渠道,增加了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使得那些一时无法离开农村的劳动人口,可通过在附近的农业公司就业,获得了比以往经营自家农田更多的收入^[13]。在工商企业务工增加了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国家对工商资本下乡所给予的,如优势特色示范项目、规模养殖场建设项目、“菜篮子”项目等专项补贴,增加了农户的转移性收入。同时,工商资本下乡使得农户的土地财产逐步实现资本化,除获得诸如承包经营权流转费用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涌现,农户还可以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从而有效带动了农户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工商资本下乡给农户带来的经济收入越多,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则越小,越有助于农户的土地转出^[14-15]。

(2)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为农户带来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了农户劳动人口从事非农产业的就业能力。通过在工商企业务工,接受较为规范的管理培训,农户的劳动人口获得了较多的相关从业技能。工商资本为农民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越多、就业稳定性越好,农户因此而获得的相关从业技能培训越多,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能力则越强。农户非农产业从业能力的增强,增加了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增进了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这种促进作用,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16]。由此可见,无论是拓宽农业收入渠道,还是提升农户的非农从业能力,均有助于缓解农户对土地的依赖。工商资本为农户离开土地所提供的经济福利补偿越多,越有助于农户的土地转出。由此,本文提出第 1 个研究假设:

H1:工商资本下乡通过经济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二)社会福利补偿

即对土地的社会功能所给予的价值补偿。土地不仅具备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17],仅停留在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基础上,意味着农地资本化过程中会有大量社会福利的损失。长期以来,农户一直将土地视为维持生存与延续生命的最后屏障。土地作为农户重要的非人力资

产要素,既表现出风险资产的特征,也表现出无风险的特征^①。

(1)工商资本下乡,为实现农户土地的保障功能提供了较好的支撑。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使得农户家庭用于养老的资本数量及其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18]。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对农户人力资本的再投资所产生的较高收入,使部分农户有能力支付自我养老及社会养老的费用^[19]。农村劳动力的就地消化或转移,可以使农民不至于为了增加收入而付出背井离乡的代价,缓解了农户因承担城市生活成本而带来的风险。同时,就近就业的务工形式可以使农户更好地为家庭提供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

(2)国家通过引导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农业领域,对农户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增进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有较好的促进作用。土地是我国农村居民社会生活的空间载体,工商资本的规模化经营,促进了农村道路交通、自来水供给、污水处理、电网、物流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为农户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流通,改善农户社会生活条件提供了便利条件,提升了农户的效用水平。随着康养、文娱、观光、休闲等一系列农业项目的实施,农户的闲暇场所逐步增多,农民的闲暇活动更为丰富,促进了邻里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换,增进了农户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对土地流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农户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工商资本下乡,农户是否享有表达机会及其权力享有的充分程度,是农户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体存在的基本体现,它关系着农户能否平等参与农村社会管理以及公平分享农村改革发展成果^[20],这不仅会直接影响农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还会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工商资本下乡,农户在合同订立、交易谈判、利益分配等方面,其知情权与决策权越得到尊重与保护,农户对土地的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认知越明确,其产生的被“剥夺感”越少,农户参与工商资本下乡的热情则越强,其土地转出意愿则越强烈^[21-22]。综上,本文提出第2个研究假设:

H2:工商资本下乡可以通过社会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三)生态福利补偿

即对基于土地的生态功能所给予的价值补偿。土地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要载体,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调节气候、保持水土、维护生物多样性和净化环境等生态功能。新时代背景下,土地的生态功能价值正凸显出来,并成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载体^[23-24]。工商资本下乡不仅改变了土地的资产价值,同时也改变了土地的资源价值。工商资本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发展现代特色农业、休闲农业等,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模式的转移^[25]。现代农业通过土地整理,改变土地的碎片化分布为规模化集中,相关涉农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土地修复及土地面貌的还原和美观,生态条件与自然景观的改善,使得农户的农业种植机会成本提高,如水土流失情况减缓、土地肥力提高、水源变得更加充足等等,减少了农民投入的成本和提升了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26],促进了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27-28]。相反,工商资本规模化、机械化的生产可能产生噪音污染,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可能导致水污染加剧,基地工厂的废气排放可能造成空气污染,由此引发农户的生态环境恶化。大量厂房、工业园区等相继建设,改变了原有耕地的肥力和耕地质量,不仅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增加了农户的额外投入成本,对农地的可持续利用造成了重要影响,不利于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为此,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

H3:工商资本下乡可以通过生态福利补偿能提升农户土地流转意愿

① 土地的无风险性表现在,中国农户家庭生产和消费的不可分性使农户的农业产出用于自身的直接消费,不必进入市场。风险性表现在农户家庭自给自足之外直接进入市场的产出部分,直接面对市场风险及自然风险。

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户的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福利补偿,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经济福利补偿是社会、生态福利补偿存在的基本前提。社会福利补偿是经济、生活福利补偿实现的主要保障。如果土地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需求,农户就无法真正地离开土地。同时,对土地生态价值补偿的忽视,使得工商资本的投入成本与潜在成本不一致,从而导致土地的粗放利用,影响了农地的可持续利用。不少地区,单纯追逐土地的经济产出,加之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户经济福利得到改善的同时,生态福利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功能被异化为土地财政这一事物,间接推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29],增进了农户的社会福利。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基本路径,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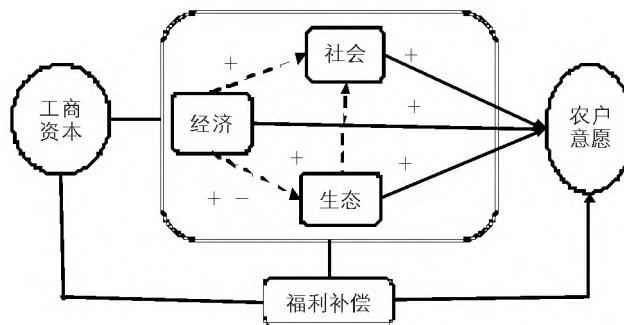


图1 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路径

四、数据来源、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一) 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

成渝地区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改革创新的重要高地,从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庆始终处于改革的核心区域。重庆属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均衡,集合与叠加了我国的东部现象与西部现象,具有我国很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省份相似的基本特点,国家批准重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希望重庆能在开创中国城乡统筹发展道路方面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故论文以重庆为例,对其农地流转的探讨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现实意义。课题组对重庆江津区、荣昌区、铜梁区、潼南区等工商资本下乡较为活跃的地区展开了调研,采取问卷调查与半结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458份,回收有效问卷410份。

调研结果显示,在农户方面:从受访者人口学特征看,男性比例占80.6%,且年龄普遍在55岁以上,受教育水平整体较低,其中文盲比例达到6.3%,这和当前农村农业劳动力年龄大、文化水平偏低的现实相吻合;从耕地资源来看,样本区域人均耕地仅有0.98亩,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符合重庆山地多平原少的地形特点;从农户类型特征上看,纯农户仅占8.7%,兼业农户占64.5%,离农户达26.7%,和当前农业比较收益低下,农业劳动力被迫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规律基本一致。在工商资本方面:从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领域来看,95.6%的土地用于农业,且绝大多数投向了收益较高的经济作物,占比74.8%,畜牧养殖占1.9%,混合利用的占16%,纯粮食种植的仅占7.3%,工商资本下乡非粮化倾向较为明显,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以中高质量的水田和旱地为主,大部分为平地及坡地;从流转年限看,10—20年占大多数,占76.7%,10年以内的占18.45%;从工商业主租金给付方式来看,近一半的农户是分年度固定现金支付,48.5%农户是按照当年谷物市场价折价分年度支付,除了租金,有13.6%的农户能够从工商业主那里得到旅游

开发、开办工厂等增值性收入或实物福利。

(二)模型构建

1. PLS 路径模型 论文主要研究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考虑到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而这种相互关系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回归结果的科学性。本文选择采用路径模型实证多维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之间的作用关系。路径模型通常应用于预测判断在多种自变量情况下,各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影响作用时的理想模型^[30]。对农户进行的福利补偿是一个包含多维度内容的抽象概念,且难以直接观察与直接测量,需通过一些外显指标来间接测量,该变量被称为潜变量,潜变量的测量指标为观察变量。将表征“因”的潜变量称为外生潜变量,表征“果”的潜变量称为内生潜变量。路径模型方程如下:

$$Y = \alpha + \beta Y + \tau X + \xi$$

其中:Y 代表内生观测变量矩阵,X 为外生潜变量矩阵,β 为内生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矩阵;τ 外生潜变量与内生变量间的路径系数矩阵;α 是截距,ξ 为内因潜变量的误差矩阵;在本文路径模型中,内生潜变量有农户流转意愿等,外生潜变量为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等。

2. Logistic 回归模型 农户总福利补偿是由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福利补偿共同构成,农户意愿既是三维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还是三者之间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为考察农户总福利补偿与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各福利补偿的重要程度不同,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各福利补偿进行权重赋值,以此为基础计算农户的总福利补偿值。农户流转意愿为因变量,属于二分变量,即“愿意”或是“不愿意”。借鉴相关研究成果,选用 logistic 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text{logit}(p_i) = \ln\left(\frac{p_i}{1 - p_i}\right)$$
$$p_i = \frac{EXP(\beta_0 + \beta_m x_m + \epsilon)}{1 + EXP(\beta_0 + \beta_m x_m + \epsilon)}$$

其中, P_i 代表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概率; x_m 代表福利补偿、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等; β_0 为常数项, β_m 代表回归系数,表示各个因素 x_m 对 P 的贡献量, ϵ 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选取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中涉及的社会福利、生态福利等相关数据较为宏观,对工商资本下乡涉农的居住生活、空气污染等福利补偿数据的经验支持也较为缺乏,本文借鉴周小刚和陈熹^[31]、周义和李梦玄^[32]等研究,将工商资本下乡前后该福利值依次赋值为 1—5,取各福利变量指标的平均值作为该福利的测量值,用工商资本下乡前后该测量值的差值来反映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福利补偿状况。同时,经济福利补偿、社会福利补偿、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会受到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农户类型等因素的影响,论文在 PLS 路径分析前,对以上控制变量作了相关性检验。由于户主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变量与农户流转意愿的相关性不显著(见表 1),故论文仅将表征农户特征的农户兼业化程度作为主要控制变量纳入 PLS 路径模型进行分析,各指标变量取值及描述统计分别见表 2、表 3。

表 1 主要控制变量与农户流转意愿相关系数矩阵($N=410$)

变量名称	户主性别	受教育程度	兼业化程度	农户流转意愿
户主性别	1	/	/	/
受教育程度	0.072	1	/	/
兼业化程度	-0.029	-0.010	1	/
农户流转意愿	-0.012	0.060	0.150**	1

注:***、**、*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表 2 路径模型相关变量解释及描述统计($N=410$)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下乡前	下乡后	下乡前	下乡后
经济福利补偿	ECWEL					
人均非农收入	ECX1	实际调查值(万元)	0.76	1.11	0.79	1.16
人均总收入	ECX2	实际调查值(万元)	0.92	1.17	0.76	1.15
人均纯收入	ECX3	实际调查值(万元)	0.57	0.76	0.72	1.11
社会福利补偿	SOWEL					
社会参与	SOXB1	不了解→了解				
资质了解度	SOX4	依次赋值1—5	—	2.55	0	1.59
合同了解度	SOX5	依次赋值1—5	—	2.11	0	1.42
政策普及度	SOX6	依次赋值1—5	—	1.82	0	1.21
社会生活	SOXB2	不方便→方便				
交通便利度	SOX7	依次赋值1—5	3.42	3.89	1.04	1.00
出行方便度	SOX8	依次赋值1—5	3.49	3.94	1.07	0.99
生活便利度	SOX9	依次赋值1—5	3.24	3.74	1.15	1.12
生态福利补偿	ENWEL	差→好				
水源质量	ENX10	依次赋值1—5	3.86	3.75	0.93	1.16
自然景观	ENX11	依次赋值1—5	3.46	3.98	1.03	1.03
空气质量	ENX12	依次赋值1—5	3.96	3.99	0.92	1.14

注:对土地的经济价值补偿尽管存在多样化的方式,但由于经济收入是农户参与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前提,也是农户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的国家,农民的经济收入能否改善还是决定农户家庭经济功能实现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农户经济福利补偿的衡量,本文主要采用了经济收入指标

表 3 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相关变量定义及描述统计($N=410$)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均值	标准差
农户意愿	WILL	愿意=1,不愿意=0	0.84	0.37
户主性别	GEN	男=1,女=0	0.81	0.40
户主年龄	AGE	连续变量(年)	62.00	9.44
教育年限	EDU	文盲=0,小学=1 初中=2 高中=3	2.23	0.57
兼业化程度	STYLE	纯农户=1,I兼农户=2,II兼农户=3,离农户=4	3.00	0.84
经济福利补偿	ECWEL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经济福利评价值的差值	0.26	0.84
社会福利补偿	SOWEL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社会福利评价值的差值	1.32	0.65
生态福利补偿	ENWEL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生态福利评价值的差值	0.15	0.83
总福利补偿	TOWEL	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值加权求和值	0.52	0.55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 变量指标的可靠性检验

工商资本下乡前后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为潜变量,由多个观测变量构成,需对指标进行可靠性检验。由表 4 可知,克朗巴哈系数均大于 0.6 标准值,抽样适当性检验和 Bartlett 球形检验均达到显著性水平,组合信度大于 0.7;AVE 平均萃取大于 0.5,因此,该指标变量的选取与

评价具有一致性,观测变量之间有较好的区别度,指标测度的可靠性通过检验。

表 4 路径模型变量指标的检验结果($N=410$)

变量指标	项数	克朗巴哈系数		KMO		因子载荷系数		CR		AVE	
		下乡前	下乡后	下乡前	下乡后	下乡前	下乡后	下乡前	下乡后	下乡前	下乡后
SOX4						—	0.782				
SOX5	3		0.740	—	0.656	—	0.861	—	0.754	—	0.515
SOX6						—	0.795				
SOX7						0.661	0.672				
SOX8	3	0.700	0.758	0.669	0.674	0.755	0.630	0.754	0.769	0.507	0.525
SOX9						0.707	0.840				
ENX10						0.758	0.701				
ENX11	3	0.773	0.761	0.700	0.694	0.670	0.701	0.780	0.760	0.542	0.519
ENX12						0.792	0.760				

注:工商资本下乡前农户对工商业主资质、合同、政策普及度并没有发生,本文直接用工商资本下乡后该数值来反映其福利补偿状况

(二) PLS 路径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研究 PLS 路径模型所呈现的关键拟合指标中,绝对拟合优度指标卡方值显著性概率 P、良适性适配指数 GFI、卡方自由度比、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以及增值拟合优度指标标准适配指数 NNFI 等都通过了统计性检验(见表 5),表明本文构建的路径模型拟合度较好,模型稳健性通过检验。

表 5 PLS 路径模型拟合指标结果($N=410$)

常用指标	X ²	df	p	卡方自由度比	GFI	RMSEA	RMR	CFI	NNFI
判断标准	—	—	>0.05	<3	>0.9	p<0.10	p<0.05	>0.9	>0.9
拟合结果	4.202	3	0.240	1.401	0.993	0.031	0.017	0.962	0.875
是否满足标准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可以

(三) 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的权重确定和一致性检验

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多维福利补偿进行权重赋值:

$$A = (a_{ij})_{n \times m}, a_{ij} > 0, a_{ji} = \frac{1}{a_{ij}}$$

其中, a_{ij} 是第 i 个因素与第 j 个因素相对于从属的上一层因素而言的相对重要性。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农户家庭生活状况之现实,本文采用和积法将分别将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标度依次设为 5、3、1,构建判断矩阵。从表 6 可知,社会、生态、经济福利补偿 5 阶判断矩阵的特征向量分别为 0.781, 0.318, 1.900, 结合特征向量计算的最大特征根为 3.039, CI 值为 0.019, 随机一致性判断指标 RI 的取值为 0.520, CR 值为 0.037<0.1, 因此,多福利补偿的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计算所得权重具有一致性(见表 6)。

表 6 多维福利补偿权重及一致性检验结果($N=410$)

项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 值	RI 值	CR 值	一致性检验
社会福利补偿	0.781	26.05%					
生态福利补偿	0.318	10.62%	3.039	0.019	0.520	0.037	通过
经济福利补偿	1.900	63.34%					

(四) 工商资本的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检验

1. Logistic 模型结果估计 从表 7 估计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 TOWEL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总福利补偿能显著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为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了检验。表 7 中,模型(1)表明,在不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农户福利补偿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模型(2)、模型(3)表明,在分别控制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农户兼业化程度等变量的条件下,农户流转意愿系数估计仍然为正,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总福利补偿对增进农户流转意愿的作用结果较为稳健,该研究结论与徐美银^[10]、兰勇,蒋黾,杜志雄等^[15]的研究结果保持一致。

表7 总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二元回归结果(N=410)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总福利补偿	3.242(0.682)***	3.31(0.701)9***	3.518(0.725)***
户主年龄		-0.244(0.367)	-0.198(0.369)
户主性别		-0.017(0.015)	-0.021(0.016)
教育年限		0.229(0.255)	0.268(0.260)
兼业化程度			0.521(0.156)***
常数项	0.329(0.271)	1.074(1.191)	-0.420(1.297)
R ²	0.071	0.077	0.101
对数似然值	328.329a	325.773a	314.715a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2. PLS模型结果估计 表8估计结果显示,路径模型假设整体来看,本文所选取的核心解释变量,绝大多数变量的符号与预期结果或常识性判断相吻合。因此,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具体来看:

表8 PLS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N=410)

	因变量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SE	Z(CR值)	P	标准化路径系数
经济福利补偿	→ 农户流转意愿	0.051	0.021	2.475	0.013	0.118**
社会福利补偿	→ 农户流转意愿	0.092	0.027	3.384	0.001	0.163***
生态福利补偿	→ 农户流转意愿	0.026	0.021	1.228	0.220	0.059
经济福利补偿	→ 生态福利补偿	-0.041	0.035	-1.157	0.247	-0.057
社会福利补偿	→ 生态福利补偿	0.108	0.062	1.731	0.083	0.085*
农户兼业化程度	→ 农户流转意愿	0.059	0.021	2.834	0.005	0.137**
农户兼业化程度	→ 社会福利补偿	0.095	0.038	2.508	0.012	0.123**

***、**、*分别代表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1)经济福利补偿:模型中经济福利补偿变量 ECWEL 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18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5 水平的显著性($z=2.475, p=0.013 < 0.05$),表明经济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存在积极影响,增加农户经济福利补偿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从而验证了假说 H1。这是因为,工商资本下乡流转土地后,很多农村家庭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通过参加季节性或临时性的工作进入非农领域;农户通过在工商企业务工,获得了相关技能培训,增强了其就业能力,减少了对土地的经济依赖,有效地促进了农地向工商资本的转出。

(2)社会福利补偿:路径模型中社会福利补偿变量 SOWEL 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163 ,并且该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z=3.384, p=0.001 < 0.01$),验证了假说 H2,即社会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工商业主下乡租赁农地通过投资于农业、旅游等产业,给当地的交通条件、农村基础服务设施等改进有一定帮助,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增进了农户之间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同时,农户对工商资本下乡政策认知越多,对农地流转合同越了解,农户的社会参与权益越能得到尊重与保障,显著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3)生态福利补偿:路径模型中生态福利补偿变量 ENWEL 对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影响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059 > 0$,但此路径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z=1.228, p=0.220 > 0.05$),说明生态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在于,一方面,样本区域目前仍处于工商资本

下乡初期阶段且生态环境较好,工商资本下乡尽管带来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变,相比工商资本下乡之前并没有显著差异,还不能有效促进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

模型中农户兼业化程度变量 $STYLE$ 对于流转意愿影响时,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137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1 水平的显著性($z = 2.834, p = 0.005 < 0.01$),这说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会对农户流转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农户的兼业化程度越高,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小,其流转意愿则越强。与此同时,变量 $STYLE$ 与社会福利补偿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123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05 水平的显著性($z = 2.508, p = 0.012 < 0.05$),说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与社会福利补偿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这可能在于,农地资本化中,农户兼业化程度越高,农地依赖程度越小的农户,尽管能较为容易地获得非农性工作,但由于国家政策不断向农村聚集,也让他们看到了农村土地未来的价值,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农地的承包权,都较为关注工商资本下乡聚集带给农村的未来升值潜力,工商资本下乡过程中其知情权、参与权更能够得到保障。农户土地依赖程度与经济、生态福利补偿之间的协方差关系(相关关系)检验没有呈现出显著性,这说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和主要收入来源都已基本脱离农村,土地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所发挥的作用强度下降,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经济、生态福利的改善对其流转决策并不能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

(4)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福利内在关系检验。从经济、社会、生态三种福利补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看(表 8),三种福利补偿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系:首先,经济福利补偿与农户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负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057 < 0$,此路径显著性尽管不明显($z = -1.157, p = 0.247 > 0.05$),但也应当注意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工商资本下乡投资发展农业被认为是加速产业聚集、提升农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方式,许多产业为改善农户居住条件、增加农民收入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调研所属的不少区域,由于经济欠发达,仍然存在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掠夺式农业发展路径,由此而引发的生态福利补偿是下降的。其次,社会福利补偿对生态福利补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其标准化路径系数值为 $0.085 > 0$,并且此路径呈现出 0.1 水平的显著性($z = 1.731, p = 0.083 < 0.1$),这可能是由于,工商资本下乡在投资农业的同时,往往伴随着村容村貌的改造,许多地方的工商业主往往会对村庄进行了艺术性美化,这一行为对农户自然景观等改善造成一定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工商资本下乡参与农户的流转意愿既是各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又是三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系。同时,多福利补偿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说明论文使用路径回归模型选择的科学性。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启示

工商资本能否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其根本在于农户的流转意愿。论文基于重庆的农户调查数据,以工商资本对农户的福利补偿为视角探讨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研究表明:第一,总体上,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能显著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具体来看,经济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带来非农从业机会的增加,使农户家庭的总体收入水平和非农从业能力得到提升,减轻了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对农户流转意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社会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带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改善,对农户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与增进农户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工商资本下乡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为实现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供了有力支撑,保障农户的社会参与权,有助于减少农户的“被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户的流转意愿;生态福利补偿方面,工商资本下乡的生态福利补偿还难以提升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第二,工商资本对农户的多重福利补偿之间存在着“协同”效应:社会福利补偿对生

态福利补偿有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经济福利补偿抑制了农户的生态福利补偿。第三,从农户来看,兼业化程度越高,工商资本的经济、生态福利补偿在农户流转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有限,这意味着,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决策的关键。基于上述研究结果,隐含的政策内涵是:

第一,探索工商资本下乡的福利补偿机制是提升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经济福利补偿方面,应拓宽探索工商资本与农户之间多样化的利益共享机制,如土地入股、技术入股等,增加农户的总体收入水平;要重点扶持吸纳就业人员多的工商企业,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农户非农从业能力,减少农户对土地的经济依赖。社会福利补偿方面,要增强工商资本对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促进作用,加大工商资本下乡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善的溢出效应,畅通工商资本下乡相关信息渠道,确保农户的知情权、参与权得到保障,以实现对农地社会价值的有效补偿或合理替代。

第二,要进一步探索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之间“协调、互动、统筹”的发展机制。研究表明,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的多元化促进了土地流转市场的活跃,但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农户流转意愿既是工商资本的经济、社会、生态福利补偿的直接映射,又是三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增进农户流转意愿,要发挥工商资本下乡多福利补偿的“协同”效应。

第三,考虑到工商资本的多福利补偿对农户流转意愿的异质性,提升农户流转意愿应给予适度区分。研究表明,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由于其家庭生计和收入来源已基本脱离农村,土地的经济、生态价值的作用强度明显下降,但出于对土地的留恋及土地带来的预期价值,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对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极为关心工商资本下乡带来的身份特征与相关利益变化。因而,促进工商资本下乡农地流转,社会福利补偿成为影响其流转的关键。

第四,从经济维度、社会维度、生态维度理解工商资本下乡的农户福利补偿,既有助于全面把握和解读福利补偿的内涵和意义,也有助于全面揭示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户流转决策背后的多维度源由。

最后,不同区域,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耕地资源对农户表现出的多功能价值认同会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仅以重庆作为研究区域进行实证,若后续可获取相关数据,将尝试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深入探讨。土地是维系农户生存的命脉,也是国家维护农村发展与稳定的基石,农地资本化事关广大农民的根本福祉。提升农户的获得感,对农户进行除经济福利之外的多种福利补偿,真正解除农户的后顾之忧,增强农户土地转出的信心,这既符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也是推进农地资本化进程的根本所在。

参考文献:

- [1] 李昊,李世平,南灵.中国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基于29篇文献的Meta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7(7):78-93.
- [2] 陈煦煦,陈凯.从福利经济视角看居民拆迁意愿及安置补偿选择——基于温州市“大建大美”拆迁社区的数据分析[J].生产力研究,2019(7):98-105.
- [3] 李国平,石涵予.比较视角下退耕还林补偿的农村经济福利效应——基于陕西省79个退耕还林县的实证研究[J].经济地理,2017(7):146-155.
- [4] 李效顺,曲福田,陈友健,等.基于福利分析的矿区耕地损失补偿测度研究——以江苏徐州煤矿开采为例[C]//中国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2012:137-146.
- [5] 张占录,张雅婷,张远索,等.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户主观认知对土地流转行为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2021(4):53-62.
- [6] 蒲实,袁威.政府信任对农地流转意愿影响及其机制研究——以乡村振兴为背景[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4):28-36.
- [7] 柴铎,董藩.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对中国征地补偿改革的启示——基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J].经济地理,2014(2):148-153.
- [8] 祝国平,郭连强,李新光.农村土地经营权规模化流转溢价:客观事实、结构特征与政策取向[J].改革,2021(1):125-133.
- [9] 张应良,徐亚东.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改革的深化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47-57.
- [10] 徐美银.农民工市民化、土地价值需求对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4省9市137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J].东北农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8-19.

- [11] 曾芬钰.我国农村土地双重功能向单一功能演变的必然趋势[J].财贸研究,2005(3):11-15.
- [12] 赵瑞红,陈红霞.农地征用补偿安置制度研究综述[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5):27-31.
- [13] 张艺,王耀.“三权分置”下内蒙古自治区农民参与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204-208.
- [14] 张占录,张雅婷,康明丽.家庭结构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9(10):74-83.
- [15] 兰勇,蒋龟,杜志雄.农户向家庭农场流转土地的续约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0(1):65-85.
- [16] 黄善林,樊文静,潘文华.土地因素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定居城镇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川鄂苏黑4省调研数据[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1(4):151-159.
- [17] 樊小钢.土地的保障功能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J].财经论丛,2003(4):9-11.
- [18] 李树苗,徐洁,左冬梅,等.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4):1-10.
- [19] 朱桂丽,石徐,孙前路,等.土地流转对农牧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基于西藏412个农牧户的实证调查[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7):1733-1735.
- [20] 王怀勇.中国农村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形成与变迁[J].社会科学研究,2013(4):80-86.
- [21] 李景刚,高艳梅,臧俊梅.农户风险意识对土地流转决策行为的影响[J].农业技术经济,2014(11):21-30.
- [22] 张永强,高延雷,王刚毅,等.黑龙江省土地转出行为分析——基于13个地市47个村的调研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6(3):68-74.
- [23] 易忠君,王振中.中国农村土地功能更迭的表象、本质与未来[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39-45.
- [24] 张路路,郑新奇,孟超,等.湖南省土地多功能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J].中国土地科学,2019(3):85-94.
- [25] 刘亚香,李阳兵.乡村转型背景下贵州坝子土地利用生产功能的空间演变[J].地理研究,2020(2):430-446.
- [26] 吴中全,杨志红,王志章.生态补偿、精英俘获与农村居民收入——基于重庆市酉阳县11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微观数据[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69-78.
- [27] 朱兰兰,蔡银莺.农户家庭生计禀赋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湖北省不同类型功能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2016(9):1526-1539.
- [28] 李瑞,芮佳雯,张跃胜.生态补偿政策对居民生态文明建设意愿的影响效应[J].改革,2019(6):114-122.
- [29] 沈坤荣,赵倩.土地功能异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J].经济学家,2019(5):94-103.
- [30] 邱皓政.量化研究与统计分析-PASW数据分析案例解析[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 [31] 周小刚,陈熹.关系强度、融资渠道与农户借贷福利效应——基于信任视角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17(1):16-29.
- [32] 周义,李梦玄.失地冲击下农民福利的改变和分化[J].农业技术经济,2014(1):73-80.

The Influence of Welfare Compensation on Farmers' Willingness of Transferring the Land into Capital

LI Guozhen¹, ZHANG Yingliang², YI Yuyuan³

(1,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3,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Chongqing, the PLS path model is applied to testify the effect of welfare compensation on farmers' land transfer willingness.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by increasing their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ing their employability,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enhances farm households'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so as to levitate their reliance on the land and agriculture.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service system brought by the capital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farm households. Farmers' rights to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respected and safeguarded, which helps to reduce their "sense of being deprived" and thus enhances their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Second, social welfare compensation has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 on ecological welfare compensation, while economic welfare compensation inhibits ecological welfare compensation. Third,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farmers' concurrent business, the more limited the role of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welfare compensation in farm households' land transfer decision-making. And social welfare compensation becomes the crucial factor to affect their consideration and decisions on land transfer.

Key word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welfare compensation; farm household; willingness to transfer land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